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缓和作用与拓展[*]

徐荣华[1] 丁 毅[1] 张 跃[2] 郭永玉[1]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系统合理信念是指个体对社会系统公正性与合理性的感知。理论与研究表明，系统合理信念具有防御威胁的缓和作用。它通过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以及否认或淡化威胁这 3 类心理机制维护心理健康，并受到情境、个体与时间边界的影响。然而，心理防御的解释忽视了系统合理信念通过“应对”威胁的路径以维护心理健康。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检验与发展防御—应对整合模型，重视缓和作用的消极后果，并完善相关测量和拓展研究领域。

关键词 系统合理信念，心理健康，缓和作用，防御—应对整合模型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社会公正既是个人幸福的重要基石，又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郭永玉 等, 2017)。相较于客观社会公正，社会心理学者更关注个体对社会公正性的主观感知以及它如何影响个体的态度、情感与行为。个体对社会系统的公正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感知被定义为系统合理信念(system-justifying belief; Kay & Jost, 2003)。研究者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并不总是能够客观反映真实的社会现状。即便不平等作为社会现实广泛存在，甚至严重威胁到了个人福祉(Buttrick & Oishi, 2017; Zhang & Churchill, 2020)，个体(甚至是弱势者)仍然表现出强烈的认可社会现状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倾向(丁毅, 纪婷婷, 2021; 杨沈龙 等, 2013)。对这一怪异现象的种种解释中，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Jost & Banaji, 1994; Jost et al., 2004)的视角与逻辑被研究者们广泛认可。

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个体支持与捍卫当前社会系统，满足了自身三类需要，其一是认

收稿日期：2023-05-12

[*]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CSH053)、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BK2022037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971120)资助。

通信作者：丁毅，E-mail: yiding2017@hotmail.com

识性需要(epistemic need)，以降低不确定性与含糊性；其二是存在性需要(existential need)，以缓解威胁与不安全感；其三是关系性需要(relational need)，以维护社会联系与共同现实感(Hennes et al., 2012; Jost, 2019)。换言之，个体接纳系统合理信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维护社会现状的动机性需要(Kay & Jost, 2003)。该理论进一步指出，在面对社会不平等现状时，系统合理信念具有缓和作用(palliative function; Jost & Hunyady, 2002)：它有助于个体在压力情境中降低负性情绪(如焦虑和抑郁)、提升正性情绪(如希望)并对生活境况更为满意，进而维护心理健康(Jost, 2019)。简而言之，个体认可与捍卫系统现状，其目的在于应对由社会不平等所产生的各类压力，即体现为威胁与防御的心理过程(Jonas et al., 2014)，而缓和作用则表现为这一防御过程的积极心理效应。

缓和作用的提出，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对该效应进行探究，并将其从社会经济领域拓展至了诸如种族、性别和性少数等领域(e.g., Bahamondes et al., 2020; Connelly & Heesacker, 2012; Napier et al., 2010; O'Brien & Major, 2005; Vargas-Salfate, 2019)。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来也有一些研究开始考察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e.g., Bahamondes et al., 2020; Li et al., 2020; McCoy et al., 2013; Vargas-Salfate, 2019)。尽管目前已有少量文献对缓和作用进行了描述和介绍(e.g., Napier et al., 2020a)，但内容较为零碎，缺乏对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的深入探讨和梳理。此外，随着研究证据的不断积累，仅基于防御视角解释系统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面临重重挑战：研究发现依据防御视角所预测的缓和作用的边界效应并不一致(Li et al., 2020; 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研究者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性成因提出了质疑(Owuamalam et al., 2019; Rubin et al., 2023)；有研究表明系统合理信念与某些应对资源间具有正向联系(Li et al., 2020; Maraş Taşkin & Şingir, 2022; Samson, 2018)。鉴于此，本文旨在进一步揭示系统合理信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积极关联，突破现有理论视角的局限，引导后续研究的方向。首先，基于对以往文献的整合，本文概括并阐明了系统合理信念缓和作用的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其次，通过分析被动防御路径的不足，本文提出潜在的主动应对路径，并最终构建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防御—应对整合模型。

2 系统合理信念的缓和作用：心理机制

日常生活中，个体通常面临各类威胁事件，并由此引发不确定感与不安全感，这将导致个体产生防御反应(Jonas et al., 2014)。系统合理化理论指出，个体认可系统合理信念，就是为了应对由社会威胁产生的各类压力，从而起到维护心理健康的缓和作用(Jost & Hunyady,

2002)。那么缓和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如何维护心理健康？现有研究者对该问题的回答通常是零碎的。因此，通过整合过往文献，本文总结出缓和作用的三类心理机制：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与否认或淡化威胁。

2.1 缓解意识形态失调

意识形态失调(ideological dissonance)是认知失调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拓展(Jost et al., 2003)。它凸显了个体(尤其是弱势者)对社会不平等现状的知觉与自身默认这一不平等现状的行为或态度间的矛盾。具体而言，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系统的评价包含了两个部分，其一为规范性信念(prescriptive belief)，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想要争取与实现的理想社会状态；其二为描述性信念(descriptive belief)，代表了个体对真实社会状况的认识(Zimmerman & Reyna, 2013)。因此，当个体意识到现存社会系统无法满足自身预期时，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失调并引发负性情绪反应。由于焦虑等情绪困扰是无法长期忍受的，个体必须采取措施缓解心理失调。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与直接挑战社会不平等现状相比，解决意识形态失调的最简便方式就是通过改变自身关于现存系统的认知框架(即系统合理信念)，以使自身关于系统的认知重新恢复至一种协调状态(杨沈龙 等, 2018)。也就是说，借助于改变个体对社会系统的公正性认知，缩小描述性信念与规范性信念之间的差距，个体就能够缓解由意识形态失调引发的情绪困扰。基于加拿大学生群体，Kay 等人(2009a)证明，通过实验诱发被试的系统合理化动机(如系统依赖性、不可回避性与系统威胁)后，被试确实表现出了强烈的应然化(injunctification)倾向，即将实然(what is)视为应然(what ought to be)，将当前社会现状视为最理想与最合意状态的倾向。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接纳系统合理信念有助于促使其社会理想与现实协调一致，进而缓解自身负性情绪并提高幸福感。例如，精英主义信念(meritocracy belief)认为现存系统的财富差异主要源于个人能力与努力等绩效(merit)因素(Jost & Hunyady, 2005)，因而更赞同当前社会现状与精英主义理想间的一致性。作为广泛根植于各类国家社会体系中的系统合理信念，精英主义信念与个人福祉密切相关。一项基于欧洲 36 个国家样本的跨文化研究表明，高精英主义信念者更快乐，对生活也更满意(Hadarics et al., 2021)。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精英主义信念与自尊和身体健康间的积极关联(McCoy et al., 2013)。相似的，经济系统合理信念(economic system justification)也反映了人们认可当前经济系统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并赞同个人的经济成功只取决于个人的绩效因素。Goudarzi 等(2020)发现，持高经济系统合

理信念的美国工人或学生，在观看了无家可归者的采访视频(即经济不平等事件)后，更不容易产生失调反应，因而报告并且体验到了更少的悲伤、愤怒以及厌恶等负性情绪，该效应同样适用于日常生活情境(即偶遇穷人或富人)。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互补刻板印象(complementary stereotypes)具有合理化社会系统的功能，因而有助于缓解歧视现实与平等理想间的矛盾关系(Kay et al., 2007)。研究表明，善意性性别歧视(benevolent sexism)，即承认女性善良与温暖的同时也认为其应受男性的保护的互补性刻板印象，具有正向预测女性生活满意度的作用(Connelly & Heesacker, 2012; Napier et al., 2010)。

2.2 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

补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 Kay et al., 2008)为系统合理信念的缓和作用提供了另一解释视角。在该理论看来，个体具有追求与维持个人控制感——个人关于自身预测、影响、掌控当前和未来事件的信念——的基本动机，其本质目的在于满足将外部世界知觉为有序且非随机性的需要(Kay et al., 2009b)。然而个人控制感并不是恒定的，不同的情境与威胁事件总是使得个体对自身控制感的知觉处于波动状态。因此当个人控制感过低时，将无力应对由外部无序世界产生的焦虑感，此时个体必须依赖控制感补偿策略以重建秩序感并缓解情绪困扰(Kay et al., 2009b)。事实上，控制感补偿的核心在于重新建立个体关于外部世界的秩序性与可预测性的认知(Landau et al., 2015)。就系统合理信念而言，它为社会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明确且清晰的解释，满足了个体关于外部世界确定性知觉的需要，并提供了个人控制感，故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控制感补偿策略，进而降低焦虑情绪与维护心理健康。

相关研究证实了控制感缺乏是引发个体合理化现存系统的关键因素。例如，基于北美和欧洲的横断数据，Kay 等人(2008)发现，个体的控制感知觉负向预测对外部系统控制(即政府)的依赖。研究者进一步采用实验设计，通过要求被试回忆自身缺乏控制感的某一事件以威胁个人控制感。研究表明，相较于控制组，控制感威胁组的被试更倾向于捍卫现存社会系统，即表现出了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后续研究同样证实，威胁个人控制感将导致个体更支持精英主义信念(Goode et al., 2014)或层级结构(hierarchy; Friesen et al., 2014)，甚至是那些最具反权威特质的个体，在感受到自身控制感不足时也更加捍卫现存的政治系统(Knight et al., 2014)。作为补偿控制感的有效手段，系统合理信念为个体提供了关于世界运行的秩序性与确定性信念，有助于恢复个人控制感，而个人控制感往往被认为是促进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素(Thompson, 2021)。McCoy 等人(2013)基于美国样本发现，那些信奉精英主义信念的弱势地

位者(女性、低地位女性或非白人女性)，对于自身的生活状况具有更高的控制感，这进而导致她们表现出了更高的自尊与身体健康水平(以身体功能、整体健康和疼痛体验为指标)。Kiral Ucar 等人(2019)在土耳其大学生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效应，研究者发现假若个体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生活事件都是公平公正的，即赞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那么就能体验到更多的控制感并对生活更为满意。

2.3 否认或淡化威胁

个体于生活中遭遇的各类威胁，既包括发源于社会系统内部的威胁，如歧视；又包括源自社会系统外部的威胁，如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缓和作用的第三种心理机制体现为防止个体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即否认或淡化威胁。

有关歧视(discrimination)的研究首先为这一机制提供了支持证据。歧视是对某一群体成员(如女性、少数族裔或 LGBT 群体)的消极态度、判断或不公平对待，当个体感知到这些歧视时(即歧视知觉，perceived discrimination)，可能因此产生各类身心健康问题(Pascoe & Smart Richman, 2009)。歧视不仅是对个体福祉的威胁，也是对系统公正性的威胁(Napier et al., 2020b)。为防御来自歧视的负性影响，系统合理信念通过构建心理屏障，阻碍或歪曲了个体对于歧视的感知。研究表明，系统合理信念是导致个体否认或淡化歧视的重要前因。McCoy 和 Major(2007)通过一项混乱句子任务(scrambled sentence task)启动了女性被试的精英主义信念后发现，当被试在实验任务中申请“职位”但被拒绝时，更不愿意将这一消极结果归因于他人的性别歧视，同时在阅读性别歧视文章后也感知到了更少的性别歧视。一项纵向研究也证明少数族裔较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导致了其后更少的歧视知觉(Bahamondes et al., 2021b)。研究进一步表明，系统合理信念否认与淡化歧视的作用具有维护个体身心健康的功能。例如，Napier 等(2020b)发现女性对其群体歧视的否认或忽视都与个人福祉具有积极联系。Bahamondes 等(2020)以智利 LGBT 群体为样本也发现，高系统合理信念者更少感知到针对其内群体的性污名(sexual stigma)，因而更少受到心理困扰的影响。

另一些研究则注意到了系统合理信念在防御系统外部威胁中的积极心理效应。系统外部威胁不仅直接损害了个体的心理健康，也间接威胁了系统的稳定性与合法性(Napier et al., 2006)。例如在 2005 年飓风卡特里娜灾害中，研究者发现，尽管美国政府在灾后救援过程中暴露出了种种弱点，民众仍然通过捍卫社会现状、指责受害者或接纳刻板印象等系统合理化方式，否认了这一威胁对于美国社会系统合法性的侵害，以此重建关于社会系统的公正性信

念并缓解情绪困扰(Napier et al., 2006)。类似的，Vasilopoulos 与 Brouard(2020)发现，在 2015 年巴黎恐怖袭击背景下，那些更赞同社会系统公正性与合理性的个体，更少受到恐怖袭击的影响，即表现出了更低的恐惧与愤怒情绪以及更高的希望感。

2.4 小结

总的来说，上述三种机制从不同视角阐释了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心理机制，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特点与适用范围。具体而言：(1)缓解意识形态失调从个体关于现存系统实然与应然信念的矛盾出发，突出了系统合理信念在维护个体内在认知一致性中的积极作用，即通过将社会现状视为理想状态，个体得以缓解负性情绪；(2)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则聚焦于系统合理信念在补偿个人控制感并满足个体确定性需要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提供稳定的外部秩序与个人控制感，系统合理信念消解了个体因控制感缺失而引发的心理困扰；(3)否认或淡化威胁强调系统合理信念为个体构建心理屏障，这一机制过滤并弱化了个体对于系统内外部威胁的感知，进而在威胁情境中维护心理福祉。

3 对系统合理信念缓和作用的再检验：边界条件

上文指出，缓和作用通过 3 类心理机制维护个人心理健康。理论上而言，防御动机作为被动的威胁应对反应，其缓和作用应当在高威胁情境中表现更为凸显，即只有当外部威胁达到一定程度时，其防御动机才能够被激活，并且其积极心理效应才能够体现出来(Hadarics et al., 2021)。基于这一分析，一些研究者试图检验缓和作用是否受到某些边界因素的影响。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者主要考察了两类重要的边界条件，其一为情境边界，即社会不平等(Hadarics et al., 2021; Onraet et al., 2017; Sengupta et al., 2017)；其二为个体边界，即(低)社会地位，包括财富、性别和种族等(Hadarics et al., 2021; Li et al., 2020; Vargas-Salfate, 2019)。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指出系统合理化作为心理防御机制，仅能够暂时缓解当下威胁对于个体的负性影响，而不能够真正改善个体的生活处境，因而缓和作用可能存在短期与长期效应的不一致(Harding & Sibley, 2013; Napier et al., 2020a)，即时间边界。

3.1 情境边界：社会不平等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系统的不平等程度，决定了身处其中的个体面临潜在健康风险的多寡。那些生活在经济分配严重不平等国家中的个体，往往面临更多的心理疾病、暴力行为或药物

滥用等身心或行为问题(Wilkinson & Pickett, 2009)。社会不平等往往意味着个体对社会现状的知觉与社会理想间严重的矛盾与失调(Jost et al., 2003)，并且一个严重的不平等社会通常也预示当前社会的功能处于失调与混乱的失范状态(Casara et al., 2022)，进而导致个体产生无序感与低控制感。因此，倘若缓和作用的确能够维护个人心理健康，那么在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方，个体合理化社会现状就应该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理益处(潜在增益但非绝对值)。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研究者发现无论采用经济不平等(Gini 系数)或社会威胁(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寿命、凶杀率)为指标，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个体若赞同社会系统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则将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收益(Hadarics et al., 2021; Onraet et al., 2017)。相似地，Sengupta 等(2017)探究了象征性偏见(symbolic prejudice，一种认为弱势群体不应该因其较差的社会地位而得到任何补偿的系统合理信念)的缓和作用在新西兰不同地区间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证实，持有高象征性偏见的被试报告了更高的健康、关系、生活及安全满意度，且这一正向预测关系确实在高经济不平等地区表现更强。

3.2 个体边界：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不仅是反映个体差异的标签或特征，其本质是由个人资源(resource)以及感知到的等级(rank)共同构建的社会地位情境(Kraus et al., 2012)。地位的差异根本体现在生活情境的差异。具体来说，低地位者收入少、教育程度低、职业不稳定，居住环境充满了各类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相反，对于高地位者，资源的富足与地位的显赫使其更少受到外部威胁的影响(Kraus et al., 2012)。社会地位的情境差异事实上构成了基于地位的社会不平等，在这一不平等中，低地位者生存的生活环境更为恶劣，并且自身也更为缺乏控制感与应对资源。因此，研究者认为在这一劣势情境下，低地位者合理化现存系统必然能够获得更大的心理裨益(Hadarics et al., 2021)。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表明系统合理信念的缓和作用确实在低地位者中更强。例如，Hadarics 等(2021)基于欧洲大规模调查数据发现，个体对经济系统的合理信念正向预测了自身的快乐及生活满意度，且该积极效应在低家庭收入者中表现更强。类似的效应也在秘鲁样本中被证实(Vargas-Salfate, 2019)。

3.3 时间边界：长期与短期效应

系统合理信念作为系统维护动机，尤其对于低地位者而言，可能与自我维护动机存在冲突(Jost et al., 2004)。张跃等(2022)指出，社会不平等同时为低地位者构成了象征性威胁

(symbolic threat)与现实威胁(realistic threat)。象征性威胁挑战了低地位者对于社会系统的公正性信念，激活了系统合理化动机；而现实威胁则加重了低地位者的不利处境并损害了其身心福祉，激活了自我合理化动机。这两类动机的冲突，使得低地位者即使认可了系统合理信念，现实存在的不平等现状仍可能对其个人福祉造成实质性且持续性的消极影响。这一现象暗示，缓和作用可能具有短期与长期效应的不一致。就短期而言，系统合理信念通过 3 类心理机制，暂时缓和了当下威胁事件对于个体的负性影响，表现出维护心理福祉的短期积极效应。但就长期而言，由于缓和作用并没有真正改善个体(尤其是低地位者)的生活境况，长期存在的外部威胁仍旧持续威胁着个体，腐蚀个体的心理健康，最终引发长期的消极效应(Harding & Sibley, 2013)。尽管大量横断或实验研究证明了缓和作用的短期积极效应，但目前鲜有研究考察其长期效应，仅一些初步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证据。例如，一项基于新西兰样本的纵向研究发现，若被试当下具有高系统合理信念，确实能够降低社会性伤害经历(如受到威胁或攻击)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用，但这一积极效应仅适用于短期；当时间跨度拉伸至 1 年后，高系统合理信念表现出了长期消极效应，反而加剧了伤害经历对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Harding & Sibley, 2013)。又如，Godfrey 等(2019)以来自美国低社会地位家庭的小学生为被试进行追踪调查，发现系统合理信念与学生 6 年级时的自尊、课堂行为管理正相关，与越轨行为负相关，但对于 8 年级时的预测作用则发生了倒转。因此，缓和作用可能存在短期的积极效应与长期的消极效应。

3.4 小结

综上所述，基于防御动机的逻辑，研究者提出了影响缓和作用的情境、个体与时间边界，并为此提供了支持证据。但是，对于上述边界条件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提供了反对证据。一项基于 18 个国家样本的纵向研究同时考察了国家不平等、社会地位以及时间跨度对缓和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具有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以及负向预测焦虑与抑郁情绪的积极效应，但这一效应并非暂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长期性(至少为 6 个月)；并且研究也未证实国家不平等程度(以 Gini 系数与人类发展指数 HDI 为指标)与主观社会地位的调节作用(Vargas-Salfate et al., 2018)。此外，有研究考察了缓和作用在不同地位者中的效应差异，但结果同样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并未给弱势地位者带去更多的心理益处(e.g., Li et al., 2020; Sengupta et al., 2017)。上述证据揭示了缓和作用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情境、地位以及时间一致性，这事实上挑战了基于防御视角所预测的缓和作用的边界效应，同时也暗示了系统合

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可能还存在某种非“防御”的路径。

4 拓展与展望

大量研究证实了系统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相关研究也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本文基于心理防御视角，概括并阐述了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即缓和作用)的 3 类作用机制，即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缺失与否认或淡化威胁；以及影响缓和作用的 3 类边界条件，即社会不平等、社会地位与短期长期效应。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近来一些研究证据开始挑战防御视角的主流解释，并指出该视角无法完整揭示系统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因此亟待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基于此，下文首先对防御视角的批评进行整理与回应，并试图通过构建防御—应对整合模型以期解决理论与研究间的分歧。此外，该领域还有一些其他关键问题值得研究者们关注。

4.1 突破防御视角的局限性：防御—应对整合模型的构建

系统合理化理论从心理防御的视角阐明了系统合理信念如何以及何时维护心理健康，该视角已成为相关领域的主流解释。但由于系统合理化理论过于聚焦动机的解释，导致其遭致一系列挑战(e.g., Owuamalam et al., 2019; Rubin et al., 2023)，并且缓和作用的实证领域也积累了一些非“防御”的证据(e.g., Li et al., 2020; Maraş Taşkin & Şingir, 2022; Samson, 2018)。立足于这些质疑与事实，本文首先提出并回应有关心理防御视角的 2 项主要批评：其一，忽视了系统合理信念构成中的认知成分；其二，忽视了系统合理信念依靠“应对”路径促进心理健康的潜在功能。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防御—应对整合模型，以洞悉两者关联的内在逻辑。

第一，个体对系统公正性的感知并不仅仅是某种防御动机的结果，也可能体现了个体非动机过程的产物。系统合理信念作为个体对社会系统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判断或评价，本质上是一种态度或信念。有研究者指出，系统合理信念能够体现为个体纯认知过程的结果，如它是对客观现状的真实反映(Owuamalam et al., 2019; Thomas, 2022)或源自某一基本认知过程的副产物(Hussak & Cimpian, 2015)。当然，本文并不否认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性来源，而是提出仅将系统合理信念视为动机的产物是片面的，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与认知构成进行概念性区分有助于理解其后续积极心理功能。本文推论，假若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构成在维护心理健康中扮演了应对威胁的暂时性的、被动性的心理防御功能，那么其认知构成，即对社

会系统公平程度的感知和判断(胡小勇 等, 2016)，可能具有一种较为稳定的、主动的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

第二，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不仅来自被动防御，也源于其对个体主动应对过程的影响。临床心理学中对适应性过程(adaptational process)的研究表明(Cramer, 1998; Kramer, 2010)，个体对逆境(adversity)的反应可以区分为两类模式，其一为防御(defense)，其二为应对(coping)。防御是无意识的、被动的且缺乏意向性的反应，而应对则是意识的、主动的并聚焦于问题解决的反应(Cramer, 1998)。防御与应对两类反应模式的区分，为理解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本文认为，系统合理信念作为一种认知构念，同样也具有影响个体“应对”反应的功能，即通过促进个体获取应对资源(coping resource)，从而维护个体心理健康(Taylor & Stanton, 2007)。一些证据为这一“应对”路径的存在提供了支持。例如，研究发现系统合理信念能够正向预测乐观心态(Maraş Taşkin & Şingir, 2022)、提升人际信任与合作(Samson, 2018; Zhang & Zhou, 2018)、增进群体认同感(Bahamondes et al., 2021a; Owuamalam et al., 2023)。此外，当个体认可系统的公正性时，也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向上流动感知(perceived upward mobility; Li et al., 2020)，而该信念往往与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关联(Sagioglou et al., 2019)。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图 1 所示的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防御—应对整合模型(the defense-coping model)。该模型提出，系统合理信念通过两条路径维护个人心理健康，其一为防御路径，其二为应对路径。防御路径指出，个体合理化现存系统是个体应对外部威胁的防御反应，它有助于个体在高压情境中缓解意识形态失调、补偿个人控制感以及弱化威胁感知，从而降低负性情绪、提升正性情绪并对生活更为满意，并且该防御路径受到情境、个体及时间边界的影响。应对路径指出，个体对社会系统公正性与合理性的感知间接影响个体对压力事件的应对反应，它与乐观心态、信任与合作、群体认同和流动知觉等应对资源具有积极关联，这些资源有助于促进个体采取积极应对策略进而维护心理健康。尽管防御与应对都具有维护心理健康的功能，但本文认为两者的作用机制间可能存在如下区别。从情境维度来看，心理防御的产生具有强情境限定性，即只发源于那些诱发个体产生系统合理化的情境，如个体面临系统威胁、低控制感或系统依赖和不可逃避性时(Friesen et al., 2019)；应对路径则具有更宽泛的情境适用性，它有助于个体应对各类或大或小的生活与工作压力(Correia et al., 2009)。从个体维度来看，心理防御的积极心理功效更适用于弱势者，即使它也可能引发消极的反作用(Bahamondes-Correa, 2016)；而应对路径则同时适用于不同地位者。从时间维度来看，防御路径的缓和本质决定了它仅具有短期的积极效应但长期的消极效应；

应对路径则更有利于个体真正解决问题，因而可能带来更为长久的积极效应(Hobfoll, 2002;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从能动性维度来看，防御路径表现为被动的压力管理过程，其往往缺乏个体的意识性与意向性(Cramer, 1998)，系统合理化理论也曾多次强调该动机具有内隐属性(e.g., Jost et al., 2004)；应对路径则反映了个体主动追求目标的潜能与意向，由社会公正感带来的乐观心态、人际信任、群体认同等，都有助于个体主动趋近期望的生活或经济目标(Hobfoll, 2002)。

防御—应对整合模型清晰地呈现了系统合理信念与心理健康间的积极关联，不仅回应了过往研究中存在的矛盾与误解，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研究与解释思路。当然，目前这一模型仍缺少坚实的研究证据，需要未来研究进行更加细致地探索和完善。

防御路径(缓和作用)

【边界条件】
社会边界
个体边界
时间边界

【心理机制】
缓解意识形态失调
补偿个人控制感
否认或淡化威胁

【系统合理信念】
动机构成
认知构成

心理健康

【应对资源】
乐观心态
信任与合作
群体认同
流动知觉
……

应对路径

图 1 系统合理信念维护心理健康的防御—应对整合模型

4.2 重视缓和作用的消极后果

尽管本文旨在分析系统合理信念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积极效应，但也必须指出其消极后果。这些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群际以及社会 3 个层面，需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在个体层面，人们(尤其是低地位者)赞同系统合理信念可能面临“双刃剑”效应。例如，O’Brien 和 Major(2005)发现，若低地位者(黑人和拉丁裔)具有低群体认同感，则系统合理信念确实能够正向预测个体心理福祉(以自尊和抑郁为指标)；但若低地位者认同感较高，则系统与群体合理化两种动机间就发生了冲突，上述积极效应就发生了倒转。又如，Dover 等(2020)以少数族裔大学生为被试，发现倘若他们持续遭遇歧视威胁，高系统合理信念便会损害其心理健

康。再如前文所述，系统合理信念具有短期的积极效应但长期的消极效应。在群际层面，系统合理信念强化了群际刻板印象。研究发现，低阶层个体如果认为社会体制是公平合理的，往往更倾向于偏爱高地位群体，即表现出外群体偏好(outgroup favoritism; Jost et al., 2004)，并且该现象多具内隐性质(Axt, 2018; Essien et al., 2021)。此外，高系统合理信念可能致使个体否认不公平事件并贬损受害者(victim derogation)，如性侵受害者(Ståhl et al., 2010)、经济失败者(Kay et al., 2005)或灾害受难者(Napier et al., 2006)。在社会层面，系统合理信念则不利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研究者指出，正是由于高系统合理信念弱化了个体对于系统的负性情绪(如愤怒感)，导致民众更不愿意采取措施改善社会现状，如支持再分配政策(Wakslak et al., 2007)、参与改善不平等现状的集体行动(Solak et al., 2021)或关注气候变化议题(Jylhä & Akrami, 2015)。

依据防御—应对整合模型，系统合理信念的消极效应事实上来源于其缓和作用，因为"缓和"仅仅起到的是麻痹自我的功能，而并不能根本"治愈"不平等现状的病症(Napier et al., 2020a)。因此，这就提醒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若想要真正提升弱势群体的福祉，就不应使其依赖一种表面的、虚幻的系统公正(即依赖缓和作用)，而应当切实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最终使得弱势群体真正能够在公正、平等的社会中受益(即促进应对资源的获取)。

4.3 完善测量与拓展研究领域

首先，关于系统合理信念的测量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当前研究广泛使用的是 Kay 与 Jost(2003)编制的一般系统合理信念量表或其改编版本。这一量表反映了个体对当前社会现状的公正性感知与捍卫倾向，实质是对描述性信念的测量。但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使用该测量结果表征个体维护系统的动机，这一简化的操作性定义并不妥当，它不仅无法有效区分"合理化的动机过程"与"合理化的结果与反应"(张跃 等, 2022)，也导致了态度与动机概念间的混淆。因此，有必要先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动机与认知构成进行概念和测量上的区分。本文建议可使用差异性术语，即当研究关注动机构成时可使用系统合理信念(system-justifying belief)或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这两个术语，当关注认知构成时可以使用系统公正信念(system fairness belief)这一术语。第二，仅仅使用描述性信念表征个体对系统公正性的知觉也是不全面的。Zimmerman 与 Reyna(2013)指出，个体对于社会系统的公正性信念一般包含了两个部分，即描述性信念与规范性信念，当且仅当两种信念协调一致

时，才能够准确预测个体对系统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基于此，结合上述防御—应对整合模型，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区分系统公正信念(认知)与系统合理化(动机)的有效测量方式。具体而言，通过同时测量个体对于系统公正性的描述性信念与规范性信念，将两者一致性程度(即将两者的差值进行反向编码)的绝对值操作性定义为系统公正信念，即高一致性程度表明高系统公正信念；而将两者一致性程度的变化值(即应然化过程，见 2.1 部分)操作性定义为系统合理化动机，即高变化值表明高系统合理化动机。

其次，关于“系统”的研究领域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在系统合理化理论中，“系统”指各种社会实体及实体之间的关系和运行规则，其外延涵盖了从较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政治系统到较小规模的家庭、组织或学校系统等(Jost & Banaji, 1994; Van der Toorn & Jost, 2014)。然而当前多数研究聚焦的“系统”仍然以社会、政治或性别等宏观系统为主，倘若个体认可某一微观系统的公正性，如学校、社区或公司等，这些微观系统合理信念是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个体心理健康呢？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往往处于多个重叠的系统之中并具有不同的身份与地位(Jost et al., 2019)。例如对于一位经济富裕的女性而言，其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性别系统中又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多个系统合理信念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于个人心理健康？总之，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理论及实践，以更好地回答系统合理信念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丁毅, 纪婷婷. (2021). 不患不均? 容忍和支持经济不平等的心理学解释. *心理科学*, *44*(2), 412–418.

郭永玉, 杨沈龙, 胡小勇. (2017). 理想天平与现实阶梯：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公平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 *32*(2), 117–127.

胡小勇, 郭永玉, 李静, 杨沈龙. (2016).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心理学报*, *48*(3), 271–289.

杨沈龙, 郭永玉, 李静. (2013). 低社会阶层者是否更相信系统公正. *心理科学进展*, *21*(12), 2245–2255.

杨沈龙, 郭永玉, 喻丰, 饶婷婷, 赵靓, 许丽颖. (2018). 系统合理化何以形成——三种不同的解释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6*(12), 2238–2248.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 公正世界信念——重建公正的双刃剑. *心理科学进展*, *21*(1), 144–154.

张跃, 丁毅, 杨沈龙, 解晓娜, 郭永玉. (2022).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心理科学进*

展, *30*(7), 1637–1650.

Axt, J. R., Moran, T., & Bar-Anan, Y. (2018). Simultaneous ingroup and outgroup favoritism in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9*, 275–289.

Bahamondes-Correa, J. (2016). System justification's opposite effect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est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n a gay men and lesbian sample in Chil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3*(11), 1537–1555.

Bahamondes, J., Gómez, F., Barrientos, J., Cárdenas, M., & Guzmán-González, M. (2020). Numbing the perception of stigma: System justification decrease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by reducing perceived stigma among gay men and lesbi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2), 282–309.

Bahamondes, J., Sengupta, N. K., Sibley, C. G., & Osborne, D. (2021a). Examining the relational underpinnings and consequences of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Explaining the palliative effect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0*(3), 1027–1050.

Bahamondes, J., Sibley, C. G., & Osborne, D. (2021b).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perceptions of group-based discrimination: Investigating the temporal order of the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minimization (or exagger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cross low-and high-status group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4), 431–441.

Buttrick, N. R., & Oishi, S. (2017).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1*(3), e12304.

Casara, B. G. S., Suitner, C., & Jetten, J. (2022).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on conspiracy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8*, 104245.

Connelly, K., & Heesacker, M. (2012). Why is benevolent sexism appealing? Associations with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6*(4), 432–443.

Correia, I., Kamble, S. V., & Dalbert, C. (2009).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well-being of bullies, victims and defenders: A study with Portuguese and Indian students. *Anxiety, Stress & Coping*, *22*(5), 497–508.

Cramer, P. (1998). Coping and defense mechanisms: What's the differ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6*(6), 919–946.

Dover, T. L., Major, B., & Glace, A. M. (2020). Discrimination, health, an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elieving in system fairness. *Health Psychology*, *39*(3), 230–239.

Essien, I., Calanchini, J., & Degner, J. (2021). Moderators of intergroup evaluation in disadvantaged groups: A comprehensive test of predictions from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0*(5), 1204–1230.

Friesen, J. P., Kay, A. C., Eibach, R. P., & Galinsky, A. D. (2014). Seeking structure in social organization: Compensatory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vantages of hierarc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4), 590–609.

Friesen, J. P., Laurin, K., Shepherd, S., Gaucher, D., & Kay, A. C. (2019). System justific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its contextual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315–339.

Godfrey, E. B., Santos, C. E., & Burson, E. (2019). For better or worse? System - justifying beliefs in sixth - grade predict trajectories of self - esteem and behavior across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90*(1), 180–195.

Goode, C., Keefer, L. A., & Molina, L. E. (2014). A compensatory control account of meritocrac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2*(1), 313–334.

Goudarzi, S., Pliskin, R., Jost, J. T., & Knowles, E. D. (2020). Economic system justification predicts mute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inequality.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1), 1–9.

Hadarics, M., Kende, A., & Szabó, Z. P.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meritocracy belief: The micro-and the macro-levels both coun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09080.

Harding, J. F., & Sibley, C. G. (2013).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Concurrent benefits versus longer-term costs to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3*(1), 401–418.

Hennes, E. P., Nam, H. H., Stern, C., & Jost, J. T. (2012). Not all ideologies are created equal: Epistemic, existential, and relational needs predict system-justifying attitudes. *Social Cognition*, *30*(6), 669–688.

Hobfoll, S. E. (2002).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adaptat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6*(4), 307–324.

Hussak, L. J., & Cimpian, A. (2015). An early-emerging explanatory heuristic promote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5), 739–752.

Jonas, E., McGregor, I., Klackl, J., Agroskin, D., Fritsche, I., Holbrook, C., Nash, K., Proulx, T., & Quirin, M. (2014). Threat and defense: From anxiety to approach. In J. M. Olson & M. P. Zanna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9, pp. 219–286). Academic Press.

Jost, J. T. (2019). A quarter centu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Questions, answers, criticisms, and societal ap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263–314.

Jost, J. T., Badaan, V., Goudarzi, S., Hoffarth, M., & Mogami, M. (2019). The futur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382–392.

Jost, J. T., & Banaji, M. R. (1994).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1), 1–27.

Jost, J. T., Banaji, M. R., & Nosek, B. A. (2004). A decad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ccumulated evidence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olstering of the status quo. *Political Psychology*, *25*(6), 881–919.

Jost, J. T., & Hunyady, O. (2002).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111–153.

Jost, J. T., & Hunyady, O. (2005).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5), 260–265.

Jost, J. T., Pelham, B. W., Sheldon, O., & Ni Sullivan, B. (2003).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sonance on behalf of the system: Evidence of enhanced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1), 13–36.

Jylhä, K., & Akrami, N. (2015).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denial: The role of dominance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6*, 108–111.

Kay, A. C., Gaucher, D., Napier, J. L., Callan, M. J., & Laurin, K. (2008). God and the government: Testing a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1), 18–35.

Kay, A. C., Gaucher, D., Peach, J. M., Laurin, K., Friesen, J., Zanna, M. P., & Spencer, S. J. (2009a). Inequality,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status quo: Direct evidence for a motivation to see the way things are as the way they should b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3), 421–434.

Kay, A. C., & Jost, J. T. (2003). Complementary justice: effects of" poor but happy" and" poor but honest" stereotype exemplars on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implicit activation of the justice mo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5), 823–837.

Kay, A. C., Jost, J. T., Mandisodza, A. N., Sherman, S. J., Petrocelli, J. V., & Johnson, A. L. (2007). Panglossian id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How complementary stereotypes help us to rationalize inequalit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 305–358.

Kay, A. C., Jost, J. T., & Young, S. (2005). Victim derogation and victim enhancement as alternate routes to system jus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3), 240–246.

Kay, A. C., Whitson, J. A., Gaucher, D., & Galinsky, A. D. (2009b). Compensatory control: Achieving order

through the mind,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heave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5), 264–268.

Kiral Ucar, G., Hasta, D., & Kaynak Malatyali, M. (2019).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ntrol and hopelessnes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life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43*, 68–73.

Knight, C. G., Tobin, S. J., & Hornsey, M. J. (2014). From fighting the system to embracing it: Control loss promotes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those high in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4*, 139–146.

Kramer, U. (2010). Coping and defence mechanisms: What's the difference? – Second act.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83*(2), 207–221.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3), 546–572.

Landau, M. J., Kay, A. C., & Whitson, J. A. (2015). Compensatory control and the appeal of a structured worl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3), 694–722.

Li, W., Wu, J., & Kou, Y. (2020). System justification enhances life satisfaction of high-and low-status people in Chin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1*(5), 588–596.

Maraş Taşkin, G. & Şingir, H. (2022). Optimism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tendenc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OPUS Journal of Society Research*, *19*(47), 477–489.

McCoy, S. K., & Major, B. (2007). Priming meritocracy and the psycho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3), 341–351.

McCoy, S. K., Wellman, J. D., Cosley, B., Saslow, L., & Epel, E. (2013). Is the belief in meritocracy palliative for members of low status groups? Evidence for a benefit for self-esteem and physical health via perceived control: Meritocracy and self-estee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4), 307–318.

Napier, J. L., Bettinsoli, M. L., & Suppes, A. (2020a).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129–134.

Napier, J. L., Mandisodza, A. N., Andersen, S. M., & Jost, J. T. (2006). System justification in responding to the poor and displaced in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Katrina.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6*(1), 57–73.

Napier, J. L., Suppes, A., & Bettinsoli, M. L. (2020b). Denial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women: A system justification accoun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6), 1191–1209.

Napier, J. L., Thorisdottir, H., & Jost, J. T. (2010). The joy of sexism? A multi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hostile and benevolent justifications for 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ir relation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Sex Roles*, *62*(7–8), 405–419.

O'Brien, L. T., & Major, B. (2005).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roles of group status and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12), 1718–1729.

Onraet, E., Van Assche, J., Roets, A., Haesevoets, T., & Van Hiel, A. (2017). The happiness gap between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depends on country-level threat: A worldwide multilevel study.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8*(1), 11–19.

Owuamalam, C. K., Caricati, L., Spears, R., Rubin, M., Marinucci, M., & Ferrari, A. (2023). Further evidence that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st the disadvantaged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perordinate group identification. *Acta Psychologica*, *232*, 103813.

Owuamalam, C. K., Rubin, M., & Spears, R. (2019). Revisiting 25 years of system motivation explanation for system jus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system attitud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8*(2), 362–381.

Pascoe, E. A., & Smart Richman, L. (2009).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heal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4), 531–554.

Rubin, M., Kevin Owuamalam, C., Spears, R., & Caricati, L. (2023).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system attitudes (SIMSA): Multiple explanation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by the disadvantaged that do not depend on a separate 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e.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34*(2), 203–243.

Sagioglou, C., Forstmann, M., & Greitemeyer, T. (2019). Belief in social mobility mitigates hostility resulting from disadvantaged social stand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4), 541–556.

Samson, K. (2018). Trust as a mechanism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PLOS ONE*, *13*(10), e0205566.

Sengupta, N. K., Greaves, L. M., Osborne, D., & Sibley, C. G. (2017). The sigh of the oppressed: The palliative effects of ideology are stronger for people living in highly unequal neighbourhoo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6*(3), 437–454.

Solak, N., Tamir, M., Sümer, N., Jost, J. T., & Halperin, E. (2021).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s an obstacle to social change: Linking system justificatio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45*(5), 661–682.

Ståhl, T., Eek, D., & Kazemi, A. (2010). Rape victim blaming as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 role of gender and

activation of complementary stereotyp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3*, 239–258.

Taylor, S. E., & Stanton, A. L. (2007). Coping resources, coping processes, and mental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1), 377–401.

Thomas, K. J. (2022). A dark lens or a dark world? Conceptualising Justice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7*(2), 190–198.

Thompson, S. C. (2021). The role of personal control in adaptive functioning. In C. R. Snyder, S. J. Lopez, L. M. Edwards, & S. C. Marqu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3rd ed., pp. 368–378). Oxford.

Van der Toorn, J., & Jost, J. T. (2014). Twenty year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processe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7*(4), 413–419.

Vargas-Salfate, S. (2019). The role of personal control in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Peruvian students. *Revista de Psicología Social*, *34*(1), 168–201.

Vargas-Salfate, S., Paez, D., Khan, S. S., Liu, J. H., & Gil de Zúñiga, H. (2018). System justification enhances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in 18 count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7*(3), 567–590.

Vasilopoulos, P., & Brouard, S. (2020).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affective responses to terrorism: Evidence from the November 2015 Paris Attacks. *Political Psychology*, *41*(3), 569–586.

Wakslak, C. J., Jost, J. T., Tyler, T. R., & Chen, E. S. (2007). Moral outrage mediates the dampening effect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on support for redistributive social polic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3), 267–274.

Wilkinson, R. G., & Pickett, K. E. (2009).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al dysfun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1), 493–511.

Zhang, Q., & Churchill, S. A. (2020).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60*, 101392.

Zhang, S., & Zhou, J. (2018).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 mediating rol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outcome depend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381.

Zimmerman, J. L., & Reyna, C. (2013). The meaning and role of ideology in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for high- and low-status peo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1), 1–23.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and mental health: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and an extension

XU Ronghua[1], DING Yi[1], ZHANG Yue[2], GUO Yongyu[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pertains to perceiving the fairness and legitimacy of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It fulfills a palliative function in safeguarding mental health through thre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lleviating ideological dissonance, compensating for personal control, and denying or minimizing threats.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mechanisms is also shaped by contextual, individual, and temporal factors. Nevertheless, the psychological defense viewpoint overlooks the potential role of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in fostering a "coping" approach to preserve mental healt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validate and refine the defense-coping model, focus more on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enhance the measurement tools, and expand the breadth of inquiry.

Key words: system-justifying belief, mental health, palliative function, the defense-coping model